

利用关键事件促成北京金融中心建设*

——基于伦敦和纽约的案例研究

何理¹, 董笑蕊², 韩雯³, 李昕昕³

(1.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71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070 ;
3.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 北京 102600)

摘要: 本文在路径依赖理论框架下, 分析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路径和关键事件对国际金融中心变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梳理、分析和总结了伦敦和纽约金融中心演进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后续效应和经验启示。基于上述案例研究, 结合北京经济金融发展现状, 本文提出了北京金融中心建设能够运用的关键事件及其路径选择。

关键词: 路径依赖 ; 关键事件 ; 金融中心 ; 北京

中图分类号 : F832.7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7-9041-2013(03)-0023-06

一、引言

伦敦和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 其成功不是必然的, 分析其演进轨迹, 它们都是伴随着本国及世界各国重大事件的出现而成功崛起的, 如本国经济的崛起、国际自由贸易的兴起、自然灾害破坏、区域性或世界性战争、其他国家的错误战略选择和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等。也就是说, 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 美国和英国在应对和处理各种事件方面更为成功, 因而为伦敦和纽约崛起, 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提供了机会, 并使它们始终保持持续发展。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随之上升。与此同时, 受互联网泡沫破裂、9·11事件、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次贷危机的拖累, 美国经济至今处于低迷状态。欧洲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受困于主权债务危机, 国内经济低迷, 失业率居高不下, 而德国、法国、英国等主要欧盟成员国就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方案互相掣肘, 尚未找到走出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行方案, 也无迹象显示欧盟能够很快走出危机的阴影。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 中国应该充分运用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

响力, 加快推动上海、北京和深圳向全球金融中心迈进。尤其是北京, 其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 在我国经济和金融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 北京的金融业取得迅猛发展。实际上, 北京市政府已认识到金融业在北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为此, 北京市委市政府于2008年4月正式发布了《关于促进首都金融业发展的意见》, 明确将北京定位为国家金融决策中心、金融监管中心、金融信息中心。中国可以通过提升北京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为其争取全球性的金融资源和发展机遇。

二、路径依赖理论在金融中心建设中的应用

(一) 路径依赖理论运用于金融中心建设的分析思路。

North (1990) 指出, 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 一旦在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采纳, 便会进行“自我强化”、“自我积累”, 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 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路径所替代。具体而言, 受偶然因素影响的“正反馈机制”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多重均衡, 即系统

收稿日期 : 2012-10-20

作者简介 : 何理 (1985-), 男, 湖北恩施人, 供职于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 ;

董笑蕊 (1993-), 女, 吉林长春人, 就读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 ;

韩雯 (1987-), 女, 天津人,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硕士研究生 ;

李昕昕 (1989-), 女, 河南郑州人, 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硕士研究生。

* 本文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北京市“去工业化”之都市金融中心构建研究: 产业结构变迁视角》(项目编号: 10AbJG366) 的资助。

演进的结果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多个方案;二是闭锁,一旦偶然性因素使某一方案被采纳,收益递增机制便会阻止它被其他方案所替代;三是可能低效率,即陷入闭锁状态的方案并非最优;四是路径依赖,即系统演进的路径决定于系统的初始状态,对初始状态中的偶然性事件十分敏感,系统一旦采纳某方案,该系统的演进路径便会呈现前后连贯、相互依赖的特点(刘元春,1999)。由于路径依赖理论包含了历史事件会影响未来制度变迁路径的传统思想,而且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多样性现实相吻合,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

按照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当一个经济体系进入某种低效率的演进路径时,收益递增机制和其他因素就会阻止它被其他最优方案所替代。据此推论,唯有通过外力干预和冲击从而改变其结构和行动者的基本关系,才能使其从低效率路径中逃逸。而经验证据表明,国际金融中心的演进历史与路径依赖理论逻辑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笔者将这一框架及其推论应用到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中,以探寻北京金融中心构建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

(二)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金融中心发展路径。

大体而言,国际金融中心的演变经历了兴衰更替的历史:佛罗伦萨是13世纪的国际金融中心,但14世纪时由于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不偿还其债务而大受打击,并从此一蹶不振。佛罗伦萨衰落之后,意大利凭借其建立在金银贵金属基础之上的信贷制度在热那亚崛起。但是好景不长,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取代了热那亚,因为意大利当时是都市国家,而阿姆斯特丹是一个民族国家,有整个荷兰的国力支持。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战胜拿破仑以后又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国家,而且英国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早拓展了其海外帝国,因此18世纪的伦敦取代了阿姆斯特丹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虽然19世纪和20世纪柏林、法兰克福、巴黎、苏黎世、米兰等国际金融中心先后兴起,但始终未能挑战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但是由于1929年的“大萧条”给美国造成的打击远甚于英国,因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成为世界中心货币,才使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稳固。20世纪60、70年代,香港、新加坡、东京等一些新的金融中心崛起,它们和纽约、伦敦金融中心一起引领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

全球金融中心的这种变迁史显示,外部偶然因素如主权国风险、技术进步、市场机遇、战争、经济起飞、监管政策等是决定一个金融中心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据此,笔者结合路径依赖理论,将金融中心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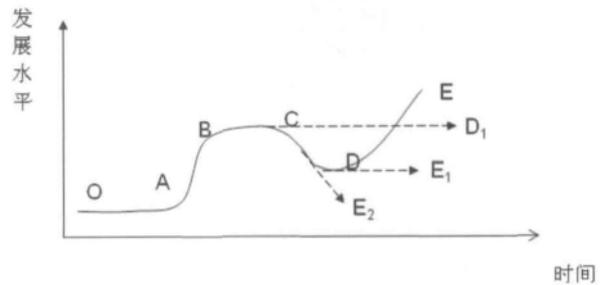


图1 基于路径依赖理论的金融中心发展路径

衰演变史的多重选择路径归纳到图1中。

如图1所示,OA阶段,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初始阶段,按照路径依赖理论,金融中心在诸如经济增长、政策监管和其他外部因素作用下保持稳定发展,而且其规模效应、学习效应、技术创新不断强化,从而推动其进入AB阶段。

AB阶段是金融中心扩张阶段,由于金融中心的规模效应、学习效应、协作效应、技术溢出效应等各种好处在此阶段得到充分发挥,因而使其获得了快速扩张。但是随着金融中心的迅速扩张及其带来的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市场不断完善和饱和。因此,最终在某一时间点,金融中心的各种利益得到完全释放,因而由扩张转为BC阶段的稳定发展。

在BC阶段,金融中心可能维持发展势头,即沿着CD₁方向持续发展,也可能受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国际政治压力和国外金融中心竞争等因素,沿着路径CD下降。

当然,一旦金融中心地位受到挑战,政府必然会出台一系列保护性政策、经济刺激计划和金融创新等应对措施,以扭转其下降趋势,从而促使其沿着路径DE向上发展;但是在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兴起的条件下,这些暂时性补救措施至多也就维持其现有发展水平,即沿着路径DE₁持续发展,而不可能重新恢复之前的金融中心地位。

实际上,正如国际金融中心演变史所显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种不利因素以及老牌金融中心在处理危机方面的迟钝反应往往使老牌金融中心的地位岌岌可危,而新兴金融中心在应对和处理危机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即新兴金融中心其实是作为现有金融中心发展困境的补救措施而出现的,因此,老牌金融中心最终被新兴金融中心所替代,从而使金融中心不是沿着路径DE₁持续发展,而是沿着DE₂路径快速下降。

综上所述,金融中心的兴起、发展、完善和衰落源于各种综合因素,既包括积极性因素,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政策保护、完善的市场体制、科技发展、

国际市场拓展等,也包括消极性因素,如经济增长放缓、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贸易保护、国外经济势力的增强、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兴起、金融危机和国内不稳定等。这些综合性因素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各种偶然性因素,如科技创新、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战争金融危机、恶化的国内政治形势等,但是就这些因素爆发的根本原因来说,它们却具有必然性,即这些偶然性特征其实是过去各种选择和制度安排长期积累的产物。就此而言,金融中心的变迁史其实是各种偶然事件所串联起来的一个必然事件。

(三) 关键事件对国际金融中心变迁的影响。

因此,关于金融中心变迁的研究隐含着如下逻辑:从长期或宏观视角来看,金融中心的兴起、发展、完善和衰落是一个历史必然过程,但是从短期或微观视角来看,它又是诸多偶然事件的产物。由此可见,长期和短期的这种内在联系,与前文所述的路径依赖框架具有逻辑一致性。此外,对于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长远目标来说,如何在短期内推动金融中心的健康发展是成功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环节。

按照路径依赖理论,一些特殊的、偶然的事件或细微变化,会对制度变迁路径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上文关于国际金融中心变迁史的分析显示,这些事件包括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环境、宏观经济政策、国内政治状况、国际政治压力、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金融监管等、国外经济发展状况和战争冲突等一系列因素。从短期来看,这些事件具有偶然性特征,尽管在长期呈现为一种必然性特征。但是在如下含义上,这些因素的确具有偶然性特征,即它们的出现表现为一种非预期的特征,或者至少人们很难预期它们出现的确切时机。

在本文,笔者将对制度变迁路径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定义为关键事件。这一界定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从事前看,这些事件具有非预期性,即虽然人们可能预期到某类事件的发生,但不能预期此类事件发生的确切时机,或者是即使人们能够预期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却不能预期事件的具体类型;二是从事后看,这类事件具有关键影响,即它们足以改变制度变迁的未来演进路径。因此,接下来的任务是,借助路径依赖框架及其关键事件概念,通过分析伦敦和纽约金融中心的演变轨迹,找出国际金融中心演变中的关键事件及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从而探索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行路径、机遇及其潜在挑战。鉴于此,下文将在路径依赖框架下分析短期内的各种偶然事件及其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方式。具体而言,本文将选取伦敦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作为考察对象,以期获得经

验启示。

三、国际金融中心案例研究:伦敦和纽约

比较分析伦敦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尽管纽约金融中心和伦敦金融中心存在激烈竞争,但是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并没有动摇伦敦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这不同于早期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其次,在新兴国际金融中心崛起的条件下,伦敦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非但没有衰落,反而不断发展,如20世纪60、70年代香港、新加坡、东京等一些新的金融中心崛起,但是它们对纽约和伦敦金融中心并没有构成实质性挑战。因此,现在的问题是,伦敦和纽约金融中心为何能够逃脱佛罗伦萨、热那亚、阿姆斯特丹等国际金融中心的衰落命运?

(一) 伦敦的案例研究。

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其起源可以追溯到5个世纪以前,但是由于数据不能追溯得更远,本文只能选取特定时期1966-2010年作为研究范围,试图通过已有数据分析历史事件的影响方式及其效果。在制度变迁研究中,缩短研究范围具有显著的局限性,因为不同时期的制度安排是不同关键事件作用下的产物,而且这类事件通常不会重演。不过,按照前文分析,路径依赖机制在联接不同时期的关键事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从而为人们通过观察现有制度安排来推断过去关键事件的后续影响提供了可能,也为预测当前关键事件对未来发展路径的潜在影响提供了基础。就此而言,研究范围缩小所引起的潜在问题可能被其优势所抵消,至少不会带来太严重的问题。

如图2所示,通过研究1966-2010年期间伦敦交易所股市市值及变化率情况,并通过回顾历史进程中伦敦及英国经济、金融发展,在路径依赖框架下描述和梳理关键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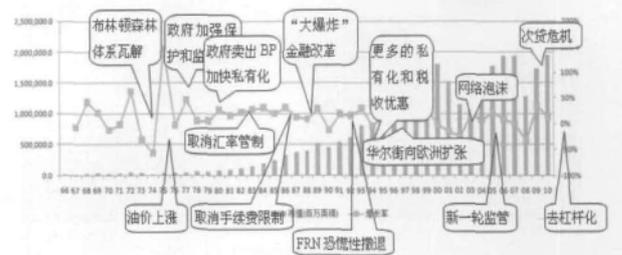


图2 1966-2010年伦敦交易所股票市值及变化率
数据来源:伦敦交易所网站。

事件1:1971年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浮动汇率推动了外汇交易,为经济和金融注入了活力。但之后的美元贬值使产油国通过提价恢复真实收入,油价翻倍引发了1974-1975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房地产崩盘。

英国政府在 1977 年卖出 BP 英国石油公司的股份,促进了私有化改革,为伦敦经济和金融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事件 2 :1979-1986 年的金融改革巩固了伦敦金融中心地位。1979 年英国宣布取消汇率管制,允许英国人在任何地方投资、买卖美元证券等。1983 年政府继而取消了交易所最低手续费限制,允许证券经纪商的竞争性定价。

事件 3 :1986 年撒切尔夫人发动了以金融综合经营为特征的金融服务业自由化改革,加快了私有化进程,向华尔街开放了金融市场。在此期间,欧洲美元市场逐步发展成为欧洲货币市场,积极的创新使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未结清 FRN (欧洲债券市场的浮动利率票据)的急剧扩张直接导致了市场崩溃。

事件 4 :1990-1995 年期间,华尔街投资银行进一步占领欧洲市场,使金融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这种残酷的金融市场竞争环境,使英国国内的银行破产或被收购,而另一些在向美国市场扩张的征途中被淘汰。

事件 5 :2000 年网络泡沫和随之而来的新一轮监管,以及 2008 年次贷危机和之后的去杠杆化,使伦敦金融中心在其既定的路径中稳步发展。但是近几十年,经济周期明显缩短,暂时的繁荣主要是由资产泡沫引起,这反映出英国经济内生动力的不足。

(二) 纽约的案例研究。

在世界范围内,纽约和伦敦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它们的兴盛繁荣既是此起彼伏又是共同发展。图 3 显示了 1900-2009 年间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交易量及其变化率。由于时间跨度大,交易量变化巨大,因此本图将交易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关键事件主要集中在战争、经济周期、金融监管等方面,因为此类事件对纽约金融中心发展路径的影响更为显著和深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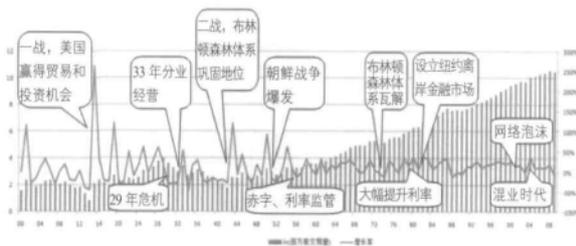


图 3 1900-2009 年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交易量及其变化率
数据来源:纽约股票交易所网站。

事件 1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处于战争状态,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受到了拖累,而美国远离战火,积极发展本国经济,这使世界经济中心向美国转移。战后,美国恢复了金本位制,美元成为国际贸易和清算

的重要手段,纽约随之崛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事件 2 :1929-1931 年金融危机之前,混业经营、监管放松、产品创新等给金融业的发展创造了空前机会,但随之而来的股市泡沫和经济衰退促使美国政府加大监管力度。1933 年政府通过实施分业经营制度,对风险进行管控。

事件 3 :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进入全面管制时期,而远离战火的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内经济迅速扩张贸易和输出资本,这为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战后,美国又通过布林顿森林体系实现了美元与英镑鼎力的国际地位,大量国际借贷和资本筹措也随之都集中于纽约,此时纽约已成为国际最大的资本供给中心。

事件 4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干预,中国派兵抗美援朝。在此期间,美国冻结了中国在美存款。由于政治风险因素,东欧各国将美元转移到英国,欧洲美元开始兴盛。此外,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和利率支付监管更促进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

事件 5 :2008 年,由华尔街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扩散到全世界范围,2010 年欧洲债务危机又开始蔓延,它们都导致了当前不景气的世界经济形势。而且短期来看,无论是纽约还是伦敦,它们都缺乏占领市场先机的资本。

(三) 案例总结。

按照上文分析,伦敦和纽约金融中心之所以能够逃脱佛罗伦萨、热那亚、阿姆斯特丹等国际金融中心的衰落命运,这可能是由于一些关键事件起了推动作用,而这些作用在路径依赖作用下又得到不断强化的结果。具体来说,伦敦和纽约金融中心的这种稳固国际地位,得益于如下关键事件的影响:

第一,伦敦和纽约金融中心的比较分析显示,在早期,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与战争高度密切相关。在这里,战争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使某一金融中心停滞,甚至衰落;另一方面,战争给其他远离战火的国家创造了机会。它们可以借此发展本国经济,获取世界经济的重要地位,从而推动国际金融中心的迅速发展。

第二,突变的技术革新、金融产品创新、对手的决策失误等,都是伦敦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壮大中的关键事件,如科技进步、宽松固定利率制度的取消等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内部关键事件,而诸如其他国家的资本管制和贸易保护等是金融中心发展的外部关键事件。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范围内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波及到整个世界范围内。在这种条

件下,各个国家的市场波动具有一致性,因而没有金融中心能够独善其身。但是,一个国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经济实力和自我竞争力,凭借比其他国家先走出危机的方式,就能够获得先机,从而吸引国际资本,推动本国金融中心的发展。

四、北京建设金融中心的基础和优势

前文指出,伦敦和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既表现为一种偶然过程,又体现为一种必然过程。之所以必然,主要是因为金融中心的演进过程中,英国和美国一直保持着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可见,任何一个金融中心的崛起,不能离脱离国家或当地经济的强大支撑,东京、新加坡和香港金融中心的崛起也不例外。因此,关于北京金融中心的建设机遇和挑战分析,需要立足于中国经济及其北京的经济金融现状。

(一) 北京金融发展现状。

如表1所示,北京市2011年GDP为16000.4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12119.8亿元,增长率8.6%,占GDP比重为75.7%。第三产业中,金融业产值2055.02亿元,增长率4.4%,产值占GDP比率为12.8%。在2011年证券市场成交额中,受股票市场行情影响,股票成交额下降,而债券交易额大幅增长。其中,股票成交额61743.2亿元,下降22.7%;基金成交额1494.8亿元,下降12.8%;债券成交额15275.3亿元,增长3.5倍。但整体证券市场成交额比2010年减少将近8000亿元。

总之,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调结构、转方式的国内大背景下,2011年北京主导产业增长放缓、对房地产的调控抑制了房地产业的发展、汽车限购政策和北京去工业化转型影响了工商业发展,这使北京经济增速出现回调,增长率低于全国增速9.2%的平均水平。同时,北京的经济结构也出现了较大变化,更加注重信息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分别增长22.9%和18.2%。

表1 2010-2011年北京市金融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

北京市金融发展指标	2010年	2011年
GDP	14113.6	16000.4
金融业增加值	1838.0	2055.0
金融业增加值/GDP	13.4	12.8
存款余额	66584.6	75001.9
贷款余额	36479.5	39660.5
金融相关率	7.3	7.2
证券市场各类证券成交额	87575.4	79103.1
保费收入	966.5	820.9

数据来源:北京市金融运行报告。

(二) 北京金融中心的特点和优势。

相对于上海、深圳金融中心,北京具有其独特优势。第一,由于“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的总部都设在北京,因此,北京自然是中央金融决策中心。第二,由于金融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而金融企业与监管机构的沟通特别重要,因此,作为金融监管机构总部聚集地,北京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信息优势。第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部、大型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总部均设在北京,而包括银行贷款、票据等一些信贷的审批权集中在商业银行总部,因此,作为金融机构总部聚集地,北京具有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总部优势。第四,我国的证券发行实施审批制而非注册制,如证券发行审批机构为证监会、企业债券的审批机构为国家发改委,这使北京成为金融审批中心。当然,相较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从证券、期货、黄金岛钻石的完备交易体系,于1994年成立的北京产权交易所目前专注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以规范和服务为原则,促进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和国有产权有序流转;二是提供非公产权交易服务,改善以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融投资环境。

五、利用关键事件影响推动北京金融中心建设的启示

由上文分析可见,如何借鉴伦敦和纽约的成功案例,趋利避害,推动北京金融中心的建设,显得十分必要。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大范围的战争和以发达国家为战场的战争很难出现,因此,借助战争推动北京金融中心建设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中国可以借西方发达国家陷于局部对外战争的困境而大力发展本国经济、提升产品竞争力和输出资本,从而推动金融中心的建设。此外,通过技术革新、金融产品创新等突变因素以及水利、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兴建来推动城市及其金融中心发展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因此,北京金融中心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合理的经济结构、不断提升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完善的金融体制、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和稳定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

结合前文分析以及伦敦和纽约的发展现状——2008年次贷危机、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经济疲软等使得欧美各国出现经济衰退,并拖累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应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契机,把握关键事件,促成北京金融中心发展路径沿着NP方向进行,从而缩小与纽约、伦敦金融中心之间的差距。具体来说,

中国可以把握和运用如下关键事件,推动北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第一,优化北京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从纽约的经验看,金融中心往往先是经济中心,其金融中心地位的几次腾飞,都与美国经济腾飞分不开。因此,北京在去工业化的进程中,必须加强第三产业发展,充分利用经济优势,保证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二,鼓励资本输出,投资国际市场。中国应抓住欧美经济低迷的时机,拓展我国企业在海外的市场。目前,欧美国家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抱有警惕心理,因此需要中国强化对欧美的外交攻势,使其认识到中国投资所带来的实际利益。

第三,规则约束下的相机抉择政策。伦敦和纽约的经验表明,在合适的时机进行适当的刺激或紧缩,会有利于提升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在当前证券市场低迷、经济形势不明朗的环境下,适当的贸易保护、投资刺激,会使北京的经济得到更快恢复,从而更具有竞争力。当然,相机抉择的政策选择必须受规则约束,而不是无约束的。

第四,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北京应多发挥金融审批的优势,以股权投资基金的形式,通过技术、资金、渠道的支持,帮助创新型企业发展,帮助小企业在全球经济复苏时期,进行市场的维护和扩张。

第五,逐步放开资本管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例如,证券方面,开放国际板,吸引国际公司到中国上市;债券方面,向欧洲发行人民币债券,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目前,中日双方的国家间合作已经显

示出中国强化人民币影响力的战略选择。

第六,将北京产权交易所拓展为全国范围的产权交易中心。虽然北京没有公开的证券交易场所,但是其证券交易活跃程度在全国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北京证券交易额占全国比率略有下降。无论如何,北京应积极抓住国家准备引入做市商制度这一时机,将北京产权交易所的产权交易范围拓展到全国的科技领域,帮助企业融资,同时提升北京交易活力,弥补北京产权交易所竞争力不足的困境。

参考文献

- [1] North D. C..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 [2] 刘元春. 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J]. 教学与研究,1999, (1).
- [3] P. A. David. Technical Choi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Essays on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 [4] Arthur W. B.. Competing Technolog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
- [5] Leibowitz S., S. Margolis. Path Dependence, Lock-in and History[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1995, (11).
- [6] 吴敬琏. 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 对诺斯教授演讲的评论[J]. 改革, 1995, (3).
- [7] 杨小凯. 后发劣势[J]. 新财经, 2004, (8).
- [8] 林毅夫.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J]. 经济学(季刊), 2003, (4).
- [9] 杨再斌.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模式选择与约束条件分析[J]. 国际金融研究, 2003, (11).

Building Beijing into A Financial Center by Making Use of Key Events: Based on Case Studies on London and New York

He Li¹, Dong Xiaorui², Han Wen³ and Li Xinxin³

(1. Institution of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Affair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3. School of Software and Microelectronics, Peking University, 1026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framework of path dependence theory, the paper analyse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and the impacts of key events 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sorts out,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key events, the follow-up effects and enlightenment of London and New York's evolvement into financial centers. Based on case study and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nditions of Beijing, the paper presents a series of key events that Beijing can make use of in building up a financial center and the path that Beijing can choose.

Key Words :Path Dependence ;Key Events ;Financial Center ;Beijing

(责任编辑:曾爱婷;校对:ZAT)